



铁皮柜间行走30年，日理档案800份

济南车管所档案员：海量档案见证了济南的变化

文/片 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刘云鹤

仓库档案摆得密密麻麻 人只能侧身通行

6月22日，记者到济南车管所采访时，李书惠正推着一辆如超市购物车一样的推车，载着一车的档案袋穿梭在各个档案柜之间。每个档案柜有2米高，身高只有1.55米的她每次整理4层以上的档案都需要像现在这样爬柜子或者踩板凳。这只是档案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，却也是最耗体力的一部分。

济南小型车辆档案库一共有300多万份档案，其中有270万份分布在济南车管所5个仓库中（剩余的30多万份在莱芜）。每个仓库的档案就有几十万份，摆得密密麻麻，柜与柜之间空间狭小，人在其中只能侧着身子行走。一个档案库从东头到西头是100米，在其中走上半年就能达到1万多步。常人一天下来早就腰酸背疼了，李书惠多年下来已经习惯了，不但练了脚力臂力，就连嗓门都练响亮了。“档案柜都是铁质的，屏蔽信号，有事只能靠‘咋呼’。”李书惠打趣道。

李书惠今年51岁，已经在交警系统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多年。2000年，她进入车管所后开始从事小型车辆档案工作，从最初的新车注册、车牌号发放，到档案的转入、变更与转出，一条线走下来，再到了现在的仓库。仓库的工作主要是过户归档、外转归档、出库、转籍、归档等。近期，国家档案局向从事档案工作三十年的人员颁发荣誉证书，李书惠也获此殊荣。

从这些档案背后，李书惠也见证了济南的发展。2000年的时候，济南的小型车辆档案只有10万份；到了2010年，达到70多万份；2014年，仅4年时间，就到了140万份；再到2021年，就到了300多万份。“一是大家的生活变好了，平均每个家庭一辆甚至两辆车；再就是济南的营商环境变好了，很多外地车到济南来挂牌。”她说。

现在，李书惠平均每天要整理800多份档案，只要一上班，手里的活就停不下来。她所在的小型车辆档案组一共9个人，每天归档、外转、电子迁出、手续入库等各类档案近万份。

弄错一个数，档案就会“走失” 再去纠正犹如大海捞针

整理档案的工作看似机械，却是相当考验人的。21到23个号段，12位档案编号，上百万的号，搞错一个数字，档案就会走错一间屋子甚至是一层楼，再去纠正无疑是大海捞针。

工作几十年，因为严谨仔细，李书惠从来没有出过错。也是因为这份严谨，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，有的问题档案她一眼就能感觉出不对劲。原来的时候看车辆附加税，她可以在没有任何仪器的情况下发现问题。几年前，李书惠经手的档案里转进来一辆红旗车，这辆车最早是在济南注册，辗转几年后又回到济南。当时已经快下班了，李书惠也没有草率，最后联系技术科的人倒查，果然查出有问题。那也是当年她查出的第一辆盗抢车。

对着一堆堆资料，一串串数字，李书惠即使看到两眼冒金星也一点都不敢马虎。在李书惠的办公桌上，台账本已摞了厚厚一层。每个本子有5厘米厚，正反两面用。翻开一本，上面的业务记录密密麻麻。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，每天干的工作能记个大概，年纪大了，李书惠担心出问题，开始习惯记台账。

在李书惠看来，认真仔细不只是对工作负责，更是对老百姓的负责。

一份档案就是车辆的一生 这份工作在她看来很有趣

在别人看来枯燥、重复的工作在李书惠眼里却是生动有趣的，一辆车从新车注册、到变更、再到销毁，就像看着一个婴儿出生、成长到最后衰老。每次的变化，可能都包含着一段故事，这一个个的故事，构成了这辆车的一生。

在档案柜上，每一辆车的档案都用一个个厚度不一的文件袋装订着，厚的档案袋能达到两三斤的重量。用李书惠的话说，这就是这辆车的一生。她随机打开一袋大约有两寸厚度的档案袋，里面是一辆小型汽车的所有材料，一共有23份。这辆车的一生是这样的：2007年在辽宁注册，它的发票、附加费、保险、身份证明收集起来，这就形成了一本档案，其间这辆车从辽宁转到临沂，中间还经过法院拍卖，共经历了6位车主，最后在济南报废。

这种情况很多，有些车辗转几个城市，从李书惠的手里几进几出。在李书惠

眼里，这些车如同一个个生命，对每一份档案负责，也是对它们这一生负责。

不过这几年，李书惠也明显感觉到，纸质的档案袋越来越薄了。过去的档案，是一张张大小不一的纸张，后来规范一些用A4纸装订，再后来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电子化影像资料走进交管部门，实物档案就越来越少了。“要是还如同以前一样全是纸质的，恐怕这栋楼也放不下了。”李书惠笑着说。

一辆车的转入转出会遇到许多的问题，为了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，李书惠还专门整理了一个退档宝典，有车辆附加费、轮胎规格、抵押、公章、压线问题等一共整理了49个文档，打开一个个文档，多的时候里面的项目能达到129个。

交管业务流程优化背后 档案员的任务更重了

在李书惠的台账本上，写着这样一句话，“任何工作都值得你全身心去爱”，她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。三十多年来，李书惠获评过优秀共产党员，立过两个三等功，九次考核优秀。旁人说起这些，李书惠摆摆手，“都是些很平常的工作。”

在每一个小型车辆电子迁出的档案袋上，都留有李书惠的个人电话。前几年的时候，无论白天晚上，她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。这几年，交管业务流程不断优化，电话也少了很多。李书惠的丈夫也是交警，也经常接到老百姓的电话，她打趣，两口子谁也别嫌弃谁，因为俩人的手机一起响。

在李书惠背后，是许许多多档案工作者，正是他们的认真和严谨，才让车辆的每一次变更都更加顺利。“因为我们做得严谨，差错率低，服务好，很多车贩子都喜欢收购济南的二手车。”济南车管所档案科科长柳滨说。

随着公安交管简政便民措施的实行，老百姓办业务越来越便利。比如一个济南人，他想带着车去青岛工作，这要在原来，办手续怎么都要折腾两三天。而现在，车主只需要在手机上用济南车管App就可操作将车转到青岛，最多只需要一天的时间。为老百姓提供便利的背后，李书惠他们的任务更重了，原来三天的活，现在要在一天内做完。

即使如此，李书惠他们依然乐在其中。他们中流行这样一句话，“让在岗位在状态成为常态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她推着推车很快消失在密密麻麻的档案海里。



身高只有1.55米的李书惠在一间档案仓库中吃力地整理档案柜最上层的材料。

	<p>邓中夏，1894年10月出生，湖南省宜章县人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，又是我党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。 1917年，23岁的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后转入哲学系学习。1919年，邓中夏参加五四运动，任北京大学联合会总干事，参与火烧赵家楼的行动。 1933年5月，邓中夏在上海工作时被捕。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、严刑拷打，他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，他对狱中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说：“请告诉大家，他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，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党员。” 1933年9月21日，南京雨花台刑场，邓中夏高呼着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，英勇就义，时年39岁。</p>	<p>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</p>
	<p>苏兆征，1885年出生在珠海淇澳岛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18岁时到香港谋生，开启了在外轮做工生涯。 1921年3月，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，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。1922年1月12日，在香港海员举行的罢工中，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谈判代表之一。 1925年3月，苏兆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8年春，苏兆征赴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，均当选为执委会委员，并当选为农村工会国际副委员长。 长期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，使苏兆征积劳成疾。1929年2月25日，苏兆征不幸病逝。在生命的最后一息，他对前去探望他的周恩来等人说：“大家同心合力，一致合作，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！”</p>	<p>为工人运动鞠躬尽瘁</p>
	<p>蔡和森，1895年出生于上海，湖南双峰人。 1913年，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，后与毛泽东成为同学。 1919年12月，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。在法国，蔡和森“疑看猛译”上百种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。他与陈独秀和毛泽东通信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，对党的性质、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，成为提出“中国共产党”名称的第一人。</p>	<p>蔡和森，1895年出生于上海，湖南双峰人。 1913年，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，后与毛泽东成为同学。 1919年12月，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。在法国，蔡和森“疑看猛译”上百种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。他与陈独秀和毛泽东通信探讨建立共产党的问题，对党的性质、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，成为提出“中国共产党”名称的第一人。</p>
	<p>1927年8月，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，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，即八七会议，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重要贡献。 1931年1月，瞿秋白遭受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迫害，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。此后，他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，和鲁迅并肩战斗，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。 1935年2月，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。6月18日，他坦然走向刑场，饮弹酒血，从容就义，时年36岁。</p>	<p>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</p>